

# 大英博物馆犯错 《女史箴图》“受虐”



《女史箴图》画卷场景之冯媛挡熊。

□程琨

## 大英博物馆 25英镑捡漏

1899年，八国联军入侵中国，英军上尉约翰逊(Clarence A. K. Johnson)将这幅《女史箴图》盗抢去了英国(他还一直狡辩说是中国的某位贵族赠送给他的)。更离谱的是，这个上尉丝毫不懂这幅画的价值，他甚至认为这幅画最值钱的地方是画卷上面绑着的玉配件，结果大英博物馆因此捡了个大漏，仅仅用25英镑就将这件至宝收入囊中。

前面所说的仅仅是《女史箴图》受难的开始，更可怕的还在后面。由于当时的英国对中国绘画一窍不通，他们盲目选择了日本屏风画的修复手法，将《女史箴图》硬生生地切割成了好几块，还装裱在了木板上，那就像是类似于蚕丝的底子，把它硬裱在木板上，必然是要随着木板开裂随后掉粉的。果不其然，等大英博物馆发现问题变得严重的时候，这件国宝已经被虐得不成样子了，最后是中国专家过去才阻止了它继续恶化，但那些已经造成的破坏，永远都无法挽回了。

## 大英博物馆 为什么会犯这些错？

中西方的绘画理念是完全不同的。西方人觉得，画就应该是一幅幅独立装裱出来的，他们无法理解中国的卷轴画，那种将画卷慢慢打开，随后画面像时间一样慢慢展现的乐趣。另外，西方人认为艺术品是神圣不可侵犯的，他们想不通为什么中国的绘画，收藏者和鉴赏家都敢在原画上盖章甚至是题字，他们不觉得这是一种传承的美，反而觉得那些盖章题字的部分并不属于原作，就是要和原作割离的。

另外，在20世纪之前，由于中国长期的闭关锁国政策，西方人是没什么渠道了解中国绘画的，西方博物馆最早的中国书画都是从日本那边流传过去的，都会带有日本人的

《女史箴图》被誉为中国绘画的开卷之作，也就是中国画的老祖宗，但很不幸的是，这件国宝至今依然流落在大英博物馆，而且受到很大破坏，可谓命运多舛。

主观意识，所以大英博物馆才会选用日本屏风画的修复手法去处理《女史箴图》。

## 打开《女史箴图》的正确方式

《女史箴图》是现存已知的、中国最早的叙事题材绢本画。它曾是各朝帝王的珍爱之物，他们在上面留下了大量的印章，最夸张的是乾隆，足足敲了37个章，还亲手画了一朵兰花。

《女史箴图》的原作者是东晋画家顾恺之(345—406)，他被后人誉为“中国画祖”，因为在顾恺之那个年代，画家都被视为工匠，没一个人会在作品上留下自己的名字。顾恺之是第一个敢于在自己作品上留下大名的人，于是他就成了我们所知道的中国的第一个画家。很可惜的是，顾恺之所画的《女史箴图》早已消失，只有几幅临摹的留存下来。目前流落在大英博物馆的这一幅是隋唐的临摹版，也是公认最接近顾恺之画风的版本，所以它才会被历代文人推崇，并受到皇室的青睐。

《女史箴图》应该算是一幅“文学插画”，因为它所画的内容，其实来源于西晋大臣张华所写的一篇诗文《女史箴》。“箴”是劝诫的意思，“女史”则是指后宫的嫔妃和女官，里面详细记载了历代贤明后妃的光荣事迹，为的就是告诫宫廷女子该如何尊崇妇德。顾恺之觉得《女史箴》这个“IP”很大，值得赠一波“流量”，便选了诗文里的12个场景将它们画了出来。

在了解这幅画的内容之后，你应该就能猜到《女史箴图》其实是一幅说教意味很浓的画作，但这其实很正常，不要忘了那可是1500多年前，绘画在当时可不是艺术，它是一种工具，它的功能就是“成人伦，助教化”，至于好不好看，那都是次要的。

我们来看一下《女史箴图》第四个场景“冯媛挡熊”，它描绘的是汉元帝在宫中观看斗兽，忽然一只黑熊跑出国栏，大家都非常害怕，唯独他的宠妃冯媛(因其妃位称号“婕妤”，故史称“冯婕妤”)勇敢地走向前去为汉元帝挡住了熊。这就是明显的教化，它在教导所有嫔妃，不管遇到什么危险情况，都应奋不顾身地舍命护君。

但顾恺之最厉害的地方，就在于他的思想突破了那个时代的局限。他当然明白自己的画作只是一幅功能性作品，是用来教育人的，没有人会在意画得好不好看，但他依然用一个画家的心态，将这幅画当成了一件艺术品，将它画出了极致的美感。

还是来看“冯媛挡熊”，小个子的冯媛站在黑熊前，神情是那么坚定，而在她身后的汉元帝显然受到了极大的惊吓，他的两撮胡子都被吓得飞了起来。汉元帝身边还有一位准备跑路的宫女，急得连屁股都撅了起来。顾恺之将一切人物都画得那么传神，难怪后来的《世说新语》会这样评价他：“顾长康画，有苍生来所无(顾恺之的画，是自人类诞生以来都不曾看见过的)。”

《女史箴图》是中国绘画的开卷之作，因为它奠定了整个中国绘画的基调，那就是重线条，不像西方更重色彩和体积。

顾恺之在这幅画里运用了他独创的“春蚕吐丝描”，也叫“高古游丝描”，主要是指他画的线条，都细得和蚕丝一样。顾恺之会极其耐心地用这种超细的线条去勾勒人物的面容神态，让每个人的眼神和表情都充满了神韵。就如同右边“画卷场景12”里的这两位宫女，她们发髻上的红色头饰、垂下来的细发、飘动的衣带，都是顾恺之用高古游丝描勾勒出来的，从而营造出了一种非常轻薄、飘逸的质感，让人回味无穷。我们经常说的“以形写神”，其实就是从顾恺之开始的。他的高古游丝描对中国绘画的影响巨大，因为一直到了明清甚至是当代，这种画法都在被不断地学习和发展。

(节选自《大英博物馆寻宝记》，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)

□张书功

在寿光市博物馆收藏的明清墓志中，有一块志文的作者是大名鼎鼎的纪晓岚，墓志的主人是寿光人李封。志文中有一句话“人以官富，公以官贫。贫则贫矣，而秋水无尘”。高度赞扬了李封为官清廉的品质，简短而富有诗意的语言也让这句话成为了经典名句，广为传颂。两人到底关系如何，纪晓岚何以给予李封如此高的评价？

## 同年之谊

纪昀(1724—1805)，字晓岚，一字春帆，晚号石云，清代直隶献县(今河北沧州市)人。李封(1723—1796)，字紫绶，号松崖，又号松园，清代寿光县西玉兔埠(今寿光市圣城街道西玉村)人。纪晓岚与李封都是出身官宦世家。

李封比纪晓岚大一岁，两人同为清乾隆十九年(1754)甲戌科进士，即同年(科举时代称同榜或同一年考中者为同年)，同授翰林院庶吉士。三年后，也就是清乾隆二十二年(1757)，纪晓岚留任翰林，授编修，李封则被派往刑部，任主事，开始各自宦宦生涯。李封于清乾隆三十八年(1773)，离开京城，出任安徽庐州府知府，后历任江西盐驿道、浙江按察使、湖南布政使、福建汀漳龙道、江苏布政使、湖北巡抚、兼署湖广总督、刑部左侍郎等职，基本在外为官。纪晓岚除乾隆二十七年(1762)，离京赴福建任学政，三十年(1765)服丧里居，三十三年(1768)至三十六(1771)遣戍乌鲁木齐赎罪外，基本在京师为官。两人同在京师为官的时间是清乾隆十九年(1754年)至清乾隆二十七年(1762年)，清乾隆三十七年和清乾隆三十八年，近十年。

这十年里，他们交往密切，通过欢宴聚会、诗歌唱和等交游活动，建立了深厚的同年之谊。纪晓岚在《李封墓志铭》中回忆说，他与李封同是乾隆甲戌科(1754年)进士，这一科人才辈出。有学问渊博，以著述成家的；有奇才博学，以词章出名的；有治理有方，以政事著称的；有品酒斗茶，流连唱和，以风流洒脱相标榜的。他们交往密切，来往不断，经常宴会游乐。纪晓岚当时正值青年，意气风发，也跟他们来来往往，洋洋自得。

纪晓岚还谈到当时他对李封的印象是淡泊寡言、清静自守，对待每位同年没有区别，也看不出亲疏，好像超然于仕宦之外。而纪晓岚的性格，据《国朝汉学师承记》记载，纪晓岚“胸怀坦率、性好滑稽……然骤闻其语，近乎诙谐，过而思之，乃名言也”。另如《续怀人诗十二首·纪尚书昀》里称赞纪晓岚是“子云笔札君卿舌，当代无人可共论”，说明纪晓岚性格诙谐机智。两人性格的不同，并没有影响他们的交往。纪晓岚在《李封墓志铭》中写下：他与李封是同年

进士，到现在已经四十三年了。老朋友相继去世，在世者已经寥若晨星。如，赋闲在京的只有给事查籛槎、太仆戈仙舟，在朝为官的只有他一人，回归故里的只有侍郎王兰泉、光禄王西庄、詹事钱竹汀、运使沈既堂、伏羌殷会詹与李封，他们之间还时时通信问讯。可见，在李封退休回家后，两人还有书信往来，延续同年之谊。

## 同道之情

# 纪晓岚为他写的墓志铭留下经典名句

『人以官富，公以官贫。贫则贫矣，而秋水无尘』

清乾隆二十二年(1757年)，李封由翰林改任刑部。有一妇人抓伤图谋不轨的公公后自缢，众人认为抓伤公公是不孝，不应表彰。李封认为，妇人当时唯恐不能幸免，于孝无所伤害，应该予以表彰。刑部侍郎钱维城接受了李封的建议，李封因此名声大噪，升刑部郎中(正五品)。

纪晓岚也把此事写进了墓志铭，“公由翰林改刑部时，有翁强污其妇。妇爪伤翁面，得免，畏其再逼，遂自经。众谓伤翁不孝，不宜旌。公谓如此时惟恐不免耳，是无伤于孝，仍宜旌。钱文敏公从公言。公缘是知名”。但是在这里，纪晓岚并没有发表议论。到了清嘉庆八年(1803年)，纪晓岚进呈《请敕下大学士九卿科道详议旌表例案折子》云：“妇女猝遭暴暴，捆绑受污，不屈见戕者，例无旌表，臣谓挥刃捐生，其志与抗节被杀无异。如忠臣烈士誓不从贼，而禁缚把持，虽使跪拜，可谓之屈膝贼廷哉！请敕交大学士九卿科道议，以与被污者略示区别，量予旌表。”纪晓岚认为，那些因为捍卫节操，最终失身被杀的妇女与坚守节操被杀者其心是相同的，就像忠臣烈士，被捆绑，强行使她跪拜，难道可以说他们屈膝投敌了吗？他建议朝廷对被奸污的妇女视情况予以旌表。可见，纪晓岚与李封的观点是相同的。

李封与纪晓岚志趣相投还体现在为官的实践中。李封为官清廉，他在由江西盐法道升任浙江按察使时，地方商人感激他革除陋规、疏理盐引，馈赠给他八千两银子，被坚决拒绝。他为官近四十年，位至封疆大吏，离任时却“宦囊萧然”，在家乡无田产高宅，私人花园。纪晓岚也是清廉为官，洁身自好。在纪晓岚八十寿辰时，门人汪德钺曾作《纪晓岚八十序》一文，称其“居台宪之首，据宗伯、司马之尊，登其堂萧然如寒素，察其舆马、衣服、饮食备数而已，其俭也若此。”朝鲜冬至使沈永兴也在其闻见录中记载：“尚书纪晓岚，文艺超伦，清白节俭……一敝裘七八年。”不仅如此，纪晓岚针对当时吏治腐败堕落的现状，还多次向乾隆皇帝进谏。由此看来，我们就不难理解，纪晓岚为何在墓志铭中着重写李封清廉的一面，并给予“人以官富，公以官贫，贫则贫矣，而秋水无尘”的高度评价，两人在为官上也可谓志同道合。